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九一〇期 ——
(二〇一三年九月十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309b)

【净化灵魂】	有灵魂的净化才有真正的社会进步	张曙光
【劫后反思】	再不道歉就迟了	张 鸣
【当事者说】	文革末期我在公安部	施义之 • 陈 枫
【口述历史】	林彪的吃喝拉撒病——访内勤刘文儒	刘家驹
【书刊评论】	“妖魔化”与“美化”皆不足为训 ——《“九一三”回望》读后	东方铁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净化灵魂】

有灵魂的净化才有真正的社会进步

• 张曙光 •

8月20日，网上发表陈毅之子陈小鲁反思文革的道歉信，他在信中表示，“作为当时（北京）八中学生领袖和校革委会主任，对校领导和一些老师、同学被批斗，被劳改负有直接责任。”向“曾经伤害过老校领导、老师和同学”郑重道歉。他指文革是个“令人恐惧的年代”，自己的道歉太迟，但必须道歉，“没有反思，谈何进步！”并表示“违反宪法，侵犯人权的非人道主义行为不应该以任何形式在中国重演！”

陈小鲁的道歉虽然有些迟了，但作为“红二代”的标志性人物，他迟到的道歉仍然具有重大的正面意义，尤其是许多红二代还在为自己文革中的罪错遮遮掩掩，或默不作声，与之相比，陈小鲁的道歉尤为可贵，或许与陈毅诚实、正直的品德、性格及家教有关，但我更相信陈小鲁的这一表态代表了改革开放后人道精神在中国大地上的恢复和自我批判意识在中国大陆的生成。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有一个特点，就是有浓厚的忧患意识，却几无自我批判精神。忧患意识

与自我批判并非没有相通之处，但在传统语境中，两者却有着质的差别：前者着眼于自己的家业、自己的江山社稷能否被子孙后代继承，根本上不脱排他性的“自私”二字；自我批判则意味着对自身的否定和超越，它指向一种高于自己及其团体的原则，这种原则是可以指向一切人的普遍原则，但它不是抽象的、虚妄的，而基于人性之自省自觉，现代的人道主义如此，后现代的非人类中心主义也如此。

由于中国人的家庭本位、家国本位，儒家讲的“仁者爱人”的原则，是“爱有等差”的，它曾经比墨家的“博爱”更有生命力和可行性，与忧患意识也可以相辅相成。但它缺少普遍的超验的维度，所以许多人做人做事难以立足大写的人，不愿也不能正视自己人性中的问题，其人道精神也因而大打折扣；即使觉得做了对不住家国的事情，指责自己，也不是基于做人的诚实和正直。而诚实和正直一旦被放逐，则人就一定会弄虚作假、蝇营狗苟，并巧言令色、文过饰非，良知就会严重受损。所以后来到了宋明理学，学者们才高度关注拓展、提升仁道原则，将人的内心之“诚”提升为普遍的天理，从而让国人真正树立孟子“民胞物与”的情怀，努力做到“与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可以说，做人的诚实和正直，与其说是基于家国的利益，不如说是基于“人”的理念和良知，前者包括不了后者，后者却能涵盖前者的正当利益。

我们已经很长时期不讲做人的“诚实”和“正直”了！因为它不符合所谓的“阶级立场”和“党性原则”，后者似乎远比前者神圣伟大。在革命年代，我们的确是靠讲阶级讲党性，让中国人超越传统的一己一家之私利，甚至将“身家性命”置之度外，投身革命的。然而，到了革命本身成了目的或异化为一些人谋取权势的虚假符号时，它就会反噬革命儿女，就会失掉追求自由平等的人性光辉，这时的“革命”本身就成了非人道反人道的恶的化身。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典型，文革中的极左领导为了把中国人悉数改造成只对“伟大领袖”及其“路线斗争”尽“忠”的“革命战士”，甚至提出所谓“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把人性、情感、生活常识或自己朴素的善恶判断力，都统统放弃，或转化为对一个偶像迷信式的崇拜，于是，革命也好，不革命也罢，在一样缺少真正的批判精神这一点上，并无本质区别。

不难发现，有忧患意识而无自我批判，这几乎是整个东方文化的特点，它在人的文化心理上的表现，则是把“面子”看得远高于“灵魂”，面子涉及的是人际关系中的羞耻，灵魂涉及到的则是深度人性。有的人即使也有灵魂，良知未泯，但只要顾及到自己的面子，尤其是自己所在群体或组织的面子，那不管做了多少对不住自己良知的东西，都要三缄其口、讳莫如深。所以，有“耻感”而无“罪感”的日本人二战时的暴行也不忏悔。当我们谴责日本人时，也应当反省自己，甚至更应当反省，因为日本战犯是对其他民族的犯罪，而文革中的中国人，包括历次灾难性的政治运动中的整人者，却是对民族同胞的犯罪。

至于文革中的一些思想文化打手，至今以“革命”自居、以“红”自居，死硬到底，他们的大限都不远了，由他们去吧，上帝一切看得明白。

陈小鲁的道歉为了什么？他说“为了灵魂的净化、社会的进步和民族的未来”，对，这才是最重要的！个人的心灵能否净化、人性能否提升，是社会有无真正的进步、民族有无光明的未来的前提。那些犯下严重罪错的人，不道歉、不忏悔，或将本属于自己的问题推给上级、推给历史、推给环境，归根到底，是这些人一直没有确立起真正的自我，自性一直载沉载浮，“心灵”、“良知”也无非是服务于自己利益和面子的工具。所以，在这些人眼里，自己的私利和脸面最重要，至于“灵魂的净化、社会的进步和民族的未来”，他们何曾真正考虑过？！

中国人的道德要好起来，中国的政治要走上正轨，中国社会要建立现代文明秩序，更不必说中国人的价值观要让全世界的人称赞，中国人就要从对自己的反省、从灵魂的净化开始！

□ 原载《共识网》

~~~~~  
【劫后反思】

再不道歉就迟了

• 张 鸣 •

近来，为“文革”期间做错事而道歉的人多了起来，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份道歉，出自陈毅之子陈小鲁之手。他郑重地为“文革”初年组织批斗学校领导和老师，为未能制止诸多违反人道的行为而道歉。他认为，现在出现了一股为“文革”翻案的潮流，实际上，“文革”是个令人恐怖的年代，还说自己的道歉太迟，但必须道歉，“没有反思，何谈进步！”

我们知道，自打“文革”结束，反思那段历史的文字不少，很多就出自“红二代”之手。但是，大家不约而同地都在谈自己和家庭在“文革”中受迫害的那段经历，而对“文革”初期组织红卫兵造反的事避而不谈。其实，不止“红二代”，就是一般人，也往往在“文革”中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他们或深或浅都是受害者，另一方面，也程度不同地参与过伤害别人。

即使我这样年纪很小的，当年也跟在大同学身后，在批斗老师的会上喊过口号。当年，很多人都程度不同地干过坏事。即使到了自己家大人被批斗之后，也有些人在“革命的感召”下，揭发批判自己家大人，甚至与之决裂。至于同学、同事之间的揭发批判和伤害，那就更多了。很多揭发、批斗、抄家、关押，以及后来的武斗，都是血淋淋的，很多人因此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文革”是个需要全民族忏悔的悲剧。这个悲剧，对我们这个民族戕害之深，恐怕再怎么估计也不为过。不仅文化，连社会道德底线，甚至号称最为牢固的家庭伦理结构，都为之崩解。“文革”造成的巨大创伤，直至今日，依旧在流血甚至化脓。但是，不知怎么一来，所有人突然之间都变成了受害者，偌大的一个民族，几亿人都在受害，而加害者只有林彪集团和“四人帮”。看当年被划为林彪死党的一些人的回忆，发现连他们也成了标准的受害者。这样一来，一场持续十年、卷入几亿人的灾难，除了几个死掉和在监狱里的人之外，在现实生活中，就没有了加害者。

没有忏悔，就没有反思。历史告诉我们，这样善于健忘的民族，类似的灾难也许还会重来。果然，经历过“文革”的一代人还没有完全老去，为“文革”翻案的潮流就开始出现。对于少数经过那场浩劫的别有用心的而言，“文革”在他们的叙事里，已经变成一场人民群众批判走资派的狂欢，一场大民主的胜利。可悲的是，这样的叙事，居然被很多没经过那段历史的年轻人所接受。在某些省市，“文革”式的运动和狂欢，刘郎二度，掀起道道狂澜。

事实证明，不勇于正视自己伤疤的民族，注定是一个短视的民族，一个屡屡犯错、犯同样错误的民族。当年，我们急于翻过那悲惨的一页，用“向前看”三个字遮蔽了对灾难的反思。结果呢，对于灾难的原因，以及灾难造成的危害也就轻描淡写地放过了。而其后遗症，在30年之后发作，还是幸运的，因为毕竟经过那个时代的很多人还活着，还有机会现身说法，帮助年轻人认清是非。

当年的过来人，大多已经垂垂老矣。自己经过的事情，尤其是那些伤良心伤人命的事情，不是我们不说，内心深处就可以过得去的。尽管当年那样做，多少有不得已的苦衷，在那个令人恐怖的年代，我们的认识也的确难以达到今天的高度，对于被运动视为“阶级敌人”的人，

我们当时不可能有人去怜悯。在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没有人类公认的人道主义底线。即使面对鲜血，有过一丝的不忍，也会赶紧谴责自己，说自己犯了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错误。

如果说，当年的我们，很不正常的话，今天，我相信那些过来人，已经有了人的正常情感，人的正常思维。我们已经知道，作为人类的一员，珍惜生命、视人如己的必要。所以，无论我们想与不想自己的过去，过去做的事情，总会随着自己的年岁增加，越来越重地折腾着你，越来越成为自己心理上的负担。

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忏悔和道歉，才能让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对于“文革”的反思具有应有的深度。中国的历史，多少朝代过去，如果后人依然复哀后人的惨痛，将不是一种缺憾，而是民族的悲哀。

□ 原载《中国青年报》2013-08-23

~~~~~

【当事者说】

文革末期我在公安部

• 施义之 • 陈 枫 •

◇ 特赦战犯

公安部在华国锋部长领导下，进行了“特赦战犯”的工作。

解放以后，从1959年开始，我们对于部分国民党、伪满高级战犯已经分别进行了六批特赦。1974年底，毛主席指示：“还有一批战犯，放下武器已关押二十多年了，还关着干什么。把他们释放了，可以来去自由。”1975年3月，华国锋召开核心小组会议，讨论贯彻毛主席这一指示，释放全部在押战犯。

在公安部、高法、统战部、中调部、新华社等单位负责人会议上，华国锋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要公安部摸清战犯名单，首先搞清国民党军队军以上、地方局以上战犯名单，并要求各单位做好特赦前的准备工作和特赦后各地安置的准备工作。

3月17日，人大常委会开会作出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犯的决定。3月18日新华社发布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犯的电讯。这次特赦战犯共293名，其中蒋军军官219名，国民党党政人员21名，特务50名，伪满战犯2名，伪蒙战犯1名。释放后有公民权，来去自由，可以去台湾。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到各个战犯管理所宣布决定。3月21日释放战犯集中到北京。由华国锋主持会议，传达了毛主席指示，宣读了国务院特赦令。3月22日，组织他们参观学习，会晤亲友，4月2日分散到各省市安置。其中有10人愿意去台湾与家人团聚，4月14日抵香港，但台湾拒不接纳，发生了张铁石（61岁，原国民党68军政工处上校处长）在港自杀身亡事件。

在后来审查被释放的战犯名单时，发现调离战管所到农场劳动的战犯被遗漏，被遗漏战犯和自1962年到1965年窜犯大陆先后被俘的武装特务和特务船的船员，共144人。中央决定把被遗漏的战犯和俘获的武装特务再作一批宽大释放。9月22日新华社发布了全部宽大释放的电讯。9月25日集中到北京。其中有65人愿意去台湾与家人团聚，分批经香港去台湾。其他也分到各地安置。还有日、韩籍特务4名，遣送回国。

第二批特赦工作因华国锋去西藏，经邓小平批示后基本上由我主持进行。两批战犯的特赦工作于1975年10月结束，在押的国民党战犯全部释放安置。

◇ 筹备召开各类专业会议

华国锋指示公安部除抓好日常业务工作外，多开点专业会议，不开全面性会议。

1975年上半年，于桑带了几个干部去广州调查，准备召开侦察工作会议。边防局的干部到黑龙江蹲点调查，准备召开边防会议。我同祝家耀带干部到上海、江苏、安徽等地调查了解治安工作面上的情况。8、9月份由铁道部、公安部联合召开了有各省、市、自治区公安厅、局长和铁路系统公安局长参加的全国铁路治安工作会议，华国锋讲了话。会上反映江苏宿迁在教育控制盲流人员方面的经验好，经华国锋批准筹备在江苏宿迁召开现场工作会。

而侦察工作会议因为于桑和祝家耀二人对文化大革命以来工作的看法分歧很大，文件迟迟起草不出来。到11月后全面“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侦察工作会议没有开成，其他专业会议做了筹备也因“反击右倾翻案风”没有开成。1975年的许多工作因此被搁置而无法完成，又投入到政治运动中。

◇ “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5年全面整顿方兴未艾，公安部正在筹备召开侦察、边防、宿迁治安工作现场会等专业会议。1975年冬毛主席从支持邓小平工作转向批判邓小平、指示“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5年11月毛主席对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反映迟群、谢静宜问题的信作了批示后，11月下旬，中央召开了党政军各部委负责人的打招呼会议，我参加了。在打招呼会上华国锋讲话说：“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接着中央发了23、26号文件，不点名地批判邓小平。在全国开始了“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

2月3日中共中央通知：毛主席提议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并批准叶剑英病休，陈锡联主持军委工作。

1976年2月5日，打招呼讲话要点向全党传达。

1976年2月25日，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和大军区负责同志会议，华国锋代表党中央讲话，说：“当前主要搞好批邓，批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推向全国。

1975年10月到1976年1月由毛远新整理毛主席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谈话，即《毛主席重要指示》。如：“对文化大革命有两种态度，一是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等等。1976年3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的通知》，和转发《毛主席重要指示》即中共中央〔1976〕4号、5号文件。同时在报刊上开展“教育大辩论”和开展对“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科学院工作汇报提

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这“三株大毒草”的批判。

从1975年11月中央23、26号文件（关于清华大学）下发到1975年底，华国锋曾多次召开公安部核心小组会议，指示“政法干校不要忙着开学，现在路线不清，不能把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的再去教育人”。当祝家耀汇报筹备侦察工作会议起草文件中与于桑的争论时，华国锋表示祝家耀的意见是对的，并说：“右倾翻案风不仅教育战线有，各条战线都有影响。”“公安部有些同志思想上总是疙疙瘩瘩，要做些调查研究，通过批判右倾翻案风，批判邓小平修正主义错误路线，解决干部的思想认识问题。公安部要带头，你们批好了，对下面有影响。”还说：“刘复之写信说他被保护审查期间，曾威带人在他的住处安窃听器，矛头是对着我的。批右倾翻案风要联系他的实际。”华国锋指示：你们把今年（1975年）的文件查一下，铁路治安会议上你们给我起草的讲话稿上有“三项指示为纲”，有机会的时候你们要检讨几句。

中央和华国锋部长的指示精神，是不能损害文化大革命。仍如部内在算旧账和反算旧账的争论时一样，首先要维护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和做法。

按华国锋的指示，我们通知不在家的核心小组成员赶回，于桑从广州、凌云从江苏宿迁、杨贵从大寨回部，共同研究如何贯彻华国锋指示，研究部署公安部内“反击右倾翻案风”。原来正进行的几个专业会议的筹备工作都停顿下来，原定召开治安工作宿迁现场会议也因抓运动是主要的而无限期推迟。

12月28日，我因发高烧住进医院。我住院期间核心小组的工作由杨贵代理。有一天杨贵、祝家耀因为在批判右倾翻案风如何联系实际问题上意见不一，到医院找我。杨贵主张联系批刘复之，祝家耀意见要批于桑。我同意了杨贵的主张，表示要按华国锋的指示重点批刘复之。另有一次杨贵来医院说：“有件事要告诉你一下，王洪文要我和祝家耀把部里的情况写个材料给他，已经拖了很长时间了，现在政治部整理了一个材料，我想送一份去。”写的什么材料什么内容以及事前如何安排的都没有告诉我。王洪文是党的副主席，虽然他不是分管公安部的，但他要祝家耀和杨贵这两个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弄材料，我是不好问的，我只有默认。过了几天杨贵又来告诉我说：“我想了一下，材料光送给王洪文不好，我给华国锋也送了一份。”材料最终也没有让我看。1976年1月26日我出院后，杨贵再也没有提起这件事。我知道华国锋看了。华是部长，他知道了就行了。

1976年2月25日，中央分批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和大军区负责人会议后，组织到会干部去清华大学看大字报。过去部里有人提议组织干部去清华大学看大字报，因为上面没有通知，我没同意。看到中央组织各地来开会的负责干部去参观，我便同意政治部组织一部分干部去参观。后来接到国务院要求各部委组织干部去清华大学参观的通知，公安部组织了干部去参观，我也去看过。

1976年3月中共中央发了〔1976〕4号、5号文件，重提了“阶级斗争为纲”，要“限制和批判资产阶级法权”，说老同志的思想还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以及“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等。

华国锋指示“要认真学习领会精神，领导首先要转好弯子，带头进行批判”。还指示“在批判邓小平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解决公安部干部的思想认识问题，使广大干部团结起来”。经核心小组讨论研究，决定先组织局以上干部学习，然后全体干部学习，半天学习半天工作。要求联系实际开展批判。联系实际中批判了刘复之、于桑和几位老局长。在公安部第一次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大会上，为了响应华国锋“领导首先要转好弯子，带头进行批判”的指示，凌云、严佑民带头发了言。我也集中了几位同志起草我的发言稿。后来因为发生

了“天安门事件”，没有再开大会，发言稿没有写成，也就没有发言。

◇ 关于“天安门事件”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去世。周总理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医院，我正好在北京医院住院，参加了守灵和向遗体告别。对于周总理的治丧规格低，许多住医院的老同志都有意见，我也有意见。在医院里我见到吴庆彤（国务院办公厅主任），向他提出我的意见，并请他转告华国锋。那时我不知道是“四人帮”在捣鬼。

由于周总理的崇高威望，人民群众对周总理的逝世无限悲痛。1976年清明节前后，广大人民群众在全国范围内自发地悼念周总理，寄托哀思，同时也发出反对江青、张春桥等的呼声。

早在3月中旬，华国锋批转来王洪文对福建陈佳忠给他来信的批件。王批：“建议公安部派人弄清反动诗词的来源。”华国锋批“立即派人协助省委查清反动诗词的来源”。我派部边防局干部侯西斌、黄斌奎去福州进行查处。

这是我最早收到中央要我们办的这类事的批件。来信是一首古体诗词，内容是悼念周总理，影射、反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华国锋在批件上定了性，也在我头脑中定了调。

3月下旬，南京的学生、工人因为对《文汇报》3月5日删去周总理对雷锋同志的题词，及在后来又发表了指桑骂槐反对周总理的文章表示抗议，举行了悼念周总理的活动，贴出责问《文汇报》，反对江青一伙的大字报。江苏省公安局来电话问我们怎么办，我要他们通过省委直接请示中央。后来我们收到中央发的“南京发生政治事件”的代电，我电告江苏省公安局，传达了中央代电的内容。不久江苏方面又来电话报告：南京开往北京的火车车厢上写有“谁反对周总理就砸烂谁的狗头”等大标语。

我一直坚信毛主席领导的党中央是正确的，认定反对毛主席和毛主席领导的党中央则是错误的。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初，中央文革小组就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发号施令。长期以来对于江青一伙的横行霸道，我是有所耳闻，也有过各种疑问。可江青与毛主席的特殊关系，使我一直认为她是代表毛主席的。林彪集团垮台后，尤其是“十大”以后，毛主席把江青一伙放在党中央重要位置上，权力越来越大，他们经常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指挥全党，有极大的欺骗性。毛主席关于批评江青一伙是“四人帮”的指示在当时并没有传达给我们，只要不是中央文件和报纸公开确定的我则认为不可信，怕犯错误。对江青一伙控制的舆论工具进行的宣传，我以为就是党中央的声音。在出现一些反常的“混乱状态”时，我没能认清这是广大人民群众自发的起来向他们斗争的行动，主观上接受了“有人利用群众怀念周总理的感情，分裂党中央”的论断；也主观的认为这样做是违背“安定团结”，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只能起到煽动、扩大事态的作用。在接到中央发出的代电后，我认为这是一起分裂党中央的事件。我在来电记录上批：这些标语是反动的，教育群众不要受骗上当，并查清幕后策划者和为首的。

3月31日，华国锋在核心小组会上提出：南京发生了政治事件，南京同北京有串联，你们要掌握情况，要注意天安门的动态。第一个送花圈的是上访的公安人员，要查出这个人来，要保证公安部下属单位不去天安门送花圈，不去凑热闹；天安门有闹事迹象，天安门在你们鼻子底下，你们有责任及时向中央反映天安门的动态。

我们立即向各局、各部属单位进行传达。当我得知部属329厂送了花圈到天安门，认为厂领导不执行华国锋的指示，把329厂的负责人找来批评了一通。

从3月底开始，首都群众自发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圈、赋诗词，悼念周总理。4月4日是清明节，数十万群众涌向天安门，有的排着整齐的队伍送花圈，有的朗诵悼念诗词，有的发表演说，同时出现了反对江青、张春桥的诗词和标语。中央政治局讨论，认为这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干扰破坏斗争大方向。当晚，北京市清理了天安门广场的花圈、诗词、标语。

“天安门事件”的清查处理是中央交由北京市委和北京市公安局负责的。第一个送花圈的人由北京市公安局找到并拘留。公安部按华国锋指示，这期间每天派十几个人到天安门广场了解动态，核心小组成员也轮流到天安门广场观察情况，随时将观察到的情况向华国锋汇报。

4月4日早上，祝家耀告诉我，王洪文在凌晨和他一起去了天安门，并要他把天安门广场上的诗词拍下来，以后好破案。祝说他已转告了市局。我知道他过去在上海是和王洪文一起的造反派兄弟。王洪文是中央副主席，直接找他，我没说什么，也没问什么。我也不能说什么。

4月5日上午，天安门广场聚集了许多群众，他们对4日夜卫戍区和市公安局收走广场上的花圈强烈不满，有拦汽车，砸外国记者照相机等行为。华国锋来电话，要我们马上派人到天安门广场了解情况并及时向他汇报。祝家耀提议：中央领导不便到现场，我们用摄像机录下来，如果中央领导要，可以送去。我没多考虑祝家耀什么用意，认为这的确便于掌握广场动态，便于汇报情况，就同意了。

我把摄像看得很简单，其实当时的设备落后，这是个边防用的远距离摄像机，很笨重，要安放在历史博物馆楼顶上才能录。历史博物馆是卫戍区守卫的，要上去必须经过吴忠同意。我们先同吴忠联系好，又请示汪东兴。汪要我们请示华国锋，但没有找到。偏巧机器又发生了故障，需要修理。

我和于桑、祝家耀、张其瑞一起先去了广场南侧的北京市公安局指挥所，又到了人民大会堂，看到广场上很乱。午饭后看到指挥所门前的汽车被烧，感到事态严重了。我给华国锋打电话汇报，是他秘书接的。同时我要人民大会堂的刘健向汪东兴报告。从人民大会堂出来，我和祝家耀到了卫戍区，见到了吴德、吴忠、刘传新。吴忠、刘传新向我们讲述了宣传车被推翻，送饭车被砸的情况。他们对我们说，中央有交代，晚上采取行动，吴德正在起草讲话稿。我知道晚上的行动毋需我们参加，就回到部里。

回来后，摄像机已修好，摄录人员也换上了军装，但还没有找到华国锋。看看天快黑了，吴德已开始讲话，我就同意把机器搬上历史博物馆录了像。后来录像带有人看过，告诉我，模模糊糊什么也看不清。

4月5日晚6时半，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发表广播讲话：“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革命群众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十时半，一万民兵、警察带木棍封锁天安门，清理广场，对滞留在广场上的群众进行了殴打和逮捕。

4月7日电台广播中共中央两个决议：一、根据毛主席提议，政治局通过，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中共中央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矛盾。根据毛主席提议，政治局通过，撤消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 追查“谣言”

“天安门事件”后，根据中央政治局决定，华国锋部署公安部负责追查“谣言”。

当时把周总理逝世后社会上流传的“总理遗言”、群众反映的不满情绪，以及没有公布的内部消息都作为谣言进行追查。我考虑到问题的复杂性，请示华国锋：如果追谣言追到领导干部怎么办？华国锋指示，“不管追到谁，一追到底”。核心小组根据华国锋的指示，起草了“电报通知”稿，经华国锋签发。公安部工作以“追谣”为重点，在全国开始了大规模的群众性“追谣”行动。

早在3月中旬，王洪文、华国锋就批示我们追查福建省发生的“反动诗词”，从4月到7月，我们先后接到许多由中央政治局委员批来的、中央各部委报来的、北京市公安局报来的“谣言”。有的转回各部委去处理，有的批到各地公安部门处理。有上面批示要我们派人协助的，还有单位要求我们派人协助的，我们也都派了干部去协助处理。科学院半导体所“追谣”审查冯应章（与邓楠有关联），纪登奎、孙健批示要我们派人协助，我执行了。三机部303所审查了与邓朴方有关联的康辉，是按三机部报来材料，我同意该部自己审查。

在“追谣”过程中，部属329厂负责人路群找我反映，该厂傅凝到叶帅家给叶帅送去一份“总理遗言”。这时我才知道329厂有个叶帅抚养大的傅凝。我想此事不宜扩散，便要路群找傅凝个别谈谈，不要把这事同别人说。后来路群把谈话情况写信告诉我，我阅后存放在文件箱准备退给路群，因路群到上海治病就搁下来了。这信没有给任何人看过，这事也没有对任何人说过。后祝家耀派工作组到329厂，不知他从什么地方得到的消息，并把傅凝的情况汇报给王洪文了。

5月初，核心小组会上向华国锋汇报了追查谣言的情况，也汇报了群众对“四人帮”的不满言论。华国锋指示公安部以追查“总理遗言”为重点，要日夜加班。我请示其他谣言还查不查，华说：“抓住查‘总理遗言’这个重点，其他就迎刃而解了。”经核心小组研究，理解为抓住追查“总理遗言”这个重点，带动对其他谣言的追查。经过发动群众追查，我们掌握“总理遗言”的线索目标集中到了杭州。华国锋指示核心小组成员亲自去杭州督促，限期一周破案，说坐火车来不及就坐飞机去。核心小组决定派祝家耀去杭州。

5月19日，中央通知我和祝家耀去汇报。在政治局会上由祝家耀汇报了到杭州追查“总理遗言”的情况。汇报到“总理遗言”的执笔人李君旭等已被拘留时，张春桥说：“你们现在查到的都是浮在水面上的，沉在水底的你们没有发现。”有人（是谁记不清了）附和道：“这些人是有后台的。”当汇报到“天安门事件”中出现的一些传言时，汪东兴说：“有些受冲击的老同志对发生‘天安门事件’幸灾乐祸，杨尚昆买酒庆祝嘛。”会上决定在杭州逮捕8人，名单是华国锋提出的。为了保密，决定由汪东兴通知铁道部安排一节包厢列车，把拘留的人从杭州送到北京。

在这次政治局会上，我请示怎样处理“追谣”中报来的涉及中央、国务院各部委的有关材料，报请谁批。会上决定：按政治局委员的分工分别报送，国务院各部委方面的报送纪登奎；人民日报、新华社方面的报送姚文元；中组部的报送张春桥；统战部的报送吴德；军队的报送陈锡联。以后我就是按这样的分工分别将有关材料报送过纪登奎、张春桥、姚文元、陈锡联、吴德。这次政治局会上决定全国继续批邓反右，停止群众性“追谣”，“追谣”转入公安部的日常工作。华国锋指示公安部发个电报通知，我照办了。

文革后期党内政治斗争愈演愈烈，我这一级干部虽为高官，但上不知“宫内事”，下不明百姓心，只为了全力以赴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作为一个冲锋陷阵的战士，对自己已经身处悬崖边

沿还浑然不知。

◇ 公安局长座谈会

1975年10月，军委扩大会议决定县市地方看押犯人的武装警察交公安部门后，决定由公安部和总参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公安局长和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后勤部长会议，讨论武装警察的供应问题。

1976年5月5日，华国锋在部核心小组会上指示：“毛主席关于‘搞社会主义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的最新指示，给公安部门提出了新课题，你们要好好研究。”同时在会上提出：“同总参一起召开武装警察供应工作会后，把各省、市、自治区的公安局长留下来开座谈会，研究毛主席最新指示，研究敌情。”并指示座谈会首先要组织大家学习中发〔1976〕4号、5号文件。

为了落实华国锋的指示，开好座谈会，核心小组研究确定：留下省、市公安厅（局）长参加会议，民警处长回去，调各厅局办公室主任来参加会议。座谈会的目的是研究敌情，贯彻华国锋关于“会议不要业务性太强，要有思想性，要学好4号、5号文件”的指示，学习领会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把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指示作为会议的指导思想。会议还决定座谈会由核心小组集体领导，凌云、张其瑞主持会务工作，核心小组成员（只有杨贵受中央委托带工作组去河南，不在部内）尽可能参加各组讨论，多听各省、市、自治区同志们的发言，多开按地区分组的召集人碰头会。

1976年6月14日，全国公安局长座谈会召开。

首先由我以上述核心小组讨论决定的基本内容进行了动员讲话，接着就是组织学习中央4号、5号文件，学习讨论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最新指示。

学习讨论中，大家话题多在对“天安门事件”和“追谣”以来社会上的种种情况、现象、传言的议论上，与会的同志提出了“这样泛泛而谈没有重点”，经召集人碰头会上汇总，秘书组把大家议论中提出的问题归纳为以下5个主要问题：

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为什么党内资产阶级与反革命联系起来；

敌人制造散布谣言，社会上有市场，内部市场也多，为什么？研究谣言的欺骗性；

公安机关如何适应当前斗争形势，斗争矛头应对准谁，斗争手段有哪些变化，同党内资产阶级斗争靠什么，对走资派怎样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资产阶级在党内，公安机关如何在党委领导下进行工作。

我在召集人碰头会上把集中的这些问题念了一遍，让大家继续讨论。

后来在碰头会上反映出主要分歧意见是对党内走资派能不能侦察，怎样侦察？有人认为走资派成为党内资产阶级了，可以侦察；有人认为走资派的活动影响社会治安，可以在治安范围内侦察；有人不同意在党内搞侦察。

我表示：历来党内路线斗争都是毛主席指出而不是侦察出来的，党内不应该搞侦察，大家有不同意见可以再讨论。

对于怎样结束会议，祝家耀在核心小组会上提议写“会议纪要”，大家都同意。我想华国锋没有时间参加会议，按期送上简报后还没有得到他的指示，可以写个“纪要”送给他看看，请他把关。核心小组讨论时决定由凌云负责起草“会议纪要”。

“纪要”稿起草后，立即送华国锋审定。送后我又打电话请示华国锋：“送去的‘纪要’稿行不行。”华国锋在电话中说：“写‘纪要’要慎重，过去中央开会搞‘纪要’都经毛主席审批。你们写‘纪要’，又没有好的观点，毛主席哪有时间审批。你们收到12号文件后，组织大家再学习4号、5号、12号文件。”我请他在会议结束时作指示讲话。他说：“没有时间，不讲了。你们自己讲。”还说：“你们做事要慎重。过去慎重做了几件好事，如特赦战犯、破获苏修特务李洪枢，大家高兴。如果不慎重，以后层层检讨就不好了。”还说：“这些话是同你们商量的，你们把我讲的话整理了到处传达，我就不敢讲话了。最后你们可以提提意见，让各省、市、自治区自己去研究。”过了三五分钟，华国锋的秘书来电话说：“走资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时我又提出请华国锋在会议结束时作指示，他说：“你们自己讲讲就结束会议。”又说：“华国锋还兼着部长呢。”我把华国锋和他秘书的话如实向核心小组传达。当时大家对“华国锋还兼着部长”这话都摸不着头脑。

学习中央4号、5号文件和以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指示作为会议的指导思想来研究敌情，是华国锋部长的布置。以这为课题讨论已经混淆了对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认识。我在会议过程中思路始终机械地停留在按华国锋的指示定了的基调内，思想深处没有好好琢磨。对于华国锋及其秘书在电话中突然的变调和含蓄的暗示，我没有理解并随之转变。核心小组中也没人提出有新的理解。

核心小组再次共同学习了中央4、5、12号文件，又讨论了怎样结束会议，当时大家都没有超脱会议的程序“有开始、有结束”的框框。决定“纪要”不搞，由我在会议结束时讲话，讲话稿仍由凌云负责起草。讲稿是在“纪要”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删除了“纪要”中“党内走资派是最危险的敌人”这类的话，但基调没有变。谁知日后竟成为我“把专政矛头指向党内”的罪行。

毛主席把反对“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提法进一步上升到“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已造成党内思想极大的混乱。华国锋又说毛主席这一最新指示“给公安部门提出了新课题”，要我们召开公安局长座谈会。在“天安门事件”被镇压之后，“反击右倾翻案风”经毛主席最新指示推动达到又一高潮的背景下，核心小组全体成员对以毛主席这一指示为会议的指导思想研究敌情，没有什么分歧意见。公安部门是专政部门，华国锋授意讨论这个问题，本就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公安战线上把党内走资派与研究敌情连起来，是严重的错误。当时认识不到，是我政治思想水平低。党的宣传媒体天天灌输“党内走资派是最危险的敌人”等极“左”论调，对我影响很大，以致不能谨慎分辨上面指示中对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已经混淆。这是我在公安部十年中最深刻的教训。

◇ 结尾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去世，我参加了治丧委员会，也参加了守灵。这是我最后出现在政治舞台上。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

为了保存毛主席的遗体，华国锋让刘湘屏找我，要我向外省市的公安部门找几个个头大的死刑犯尸体交卫生部门做试验。10月2日，我去华国锋住地汇报，请示对外省公安部门的来

人怎么讲法，华说就讲“科学实验”。接着他问我对“天安门事件”怎样看，我说：有的是诚心诚意悼念周总理的，大多数是看热闹的，闹事的是少数人。他说：你的看法和我的看法是一致的。接着他问我杨贵和祝家耀工作的情况，我说：他们的工作都很积极，杨贵工作上较老练；祝家耀看问题有些偏激。我建议有机会让他们出去看看（当时有罗马尼亚、朝鲜的公安部门邀请我们回访），过去在基层缺乏对外界的认识，出去看看对他们今后工作有好处。他说：“不见得。”他又问我是否安心在公安部工作。我因曾数次提出过要求回部队或者去别的生产部门工作，他都没同意。只好说“在一天就兢兢业业干一天”。

10月7日，杨贵说同我到秦城监狱看看防震工作搞得怎样。我早有这个想法，便一口答应“好。咱们去一趟”。杨贵又说“要祝家耀一起去吧”。我心想用这么多人去吗？但他既已说出，就同意了。在秦城监狱吃过午饭，本想再去从外地搬回北京的五七干校看看，接到纪登奎打来的电话，要我同杨贵立即到国务院办公厅去。我们到后，纪登奎就问：“街上都传开了，你们听说什么没有？”我说：“我们一早就去秦城了，没有听到什么。”纪登奎接着问：“祝家耀怎么样？”杨贵说：“就是为了这，我们把祝家耀带到秦城去的嘛。”我还在莫名其妙的时候，纪登奎说：“前天晚上已经把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抓起来了。”杨贵忙说“坚决拥护”，我也表示“坚决拥护”。接着纪登奎哈哈大笑，并说：“你们是公安部，先告诉你们，中央另找时间传达。”他还告诉我们：中央已叫马天水、王秀珍等人来北京，马表示保证上海不会发生什么问题。还说：王洪文的对立面，上海的另一个造反派头头某某某表示上海的局势可以控制。这时纪登奎拿出毛主席手迹“你办事，我放心”的复印件给我们看，并说：“这是毛主席写给华国锋的，他谦虚，过去一直没有拿出来。现在国锋同志当党的主席。”最后他说：“你们回去对祝家耀注意一下。你们可以回去了。”这时我方明白纪登奎早就把粉碎“四人帮”的事告诉了杨贵。

回部后我同杨贵商量对祝家耀如何注意，决定由杨贵的秘书来监视。

第二天，在5号楼办公会议上，我才知道于桑、严佑民已去中央搞“四人帮”专案了。杨贵接到于桑电话，指名要6个干部去搞专案。我看到名单，提出是不是还按军、干、群搭配调换几个，杨贵不同意。后来我放弃了自己的意见，按于桑的提名调走了干部。这时我竟对中央已经撇开我找他人直接布置工作毫不知晓，甚至还不在于。

11月初，湖南公安局送来了一份反华国锋的案件报告。不知为什么，当我看到这份报告时已送来三四天了。我看后除了批复他们立即严肃处理外，当即电话报告华国锋。是他秘书接的电话，说“华主席已经处理了”，他狠狠地训斥了我，说“你心中还有没有华主席”。我是最遵守组织纪律的人，一贯尊重领导。这对我的情绪打击很大，感到压力沉重。

12月底，纪登奎把核心小组成员叫去，除了讨论释放因追查“总理遗言”被抓的人外，纪登奎说：“你们公安部有人，如你们办公室主任田野，对粉碎‘四人帮’有抵制行为，性质是严重的。”又问凌云（负责祝家耀专案审查）“祝家耀表现怎样，揭发了什么问题？”凌云答：“揭发的主要是杨贵的问题。”纪登奎说：“如果他揭发杨贵的问题，那你施义之的问题就更严重了。”我对纪登奎这样的推理觉得很奇怪，心想：杨贵和祝家耀是中央学习班的同学，同时被派到公安部，来部后又长期住在一起，相互了解的当然多了，与我有何关系。怎么祝家耀揭发了杨贵的问题，说明我的问题更严重了？

1977年5月，我被停职审查。直到1983年12月公安部才将对我的审查结论处理报告上报中央。报告是刘复之签发的。1985年1月中央书记处作了批复。

至此，我入党47年，入伍47年，比生命还看重的政治生命——党籍、军籍被开除了。每月给生活费150元。

□ 《炎黄春秋》2013年第8期

~~~~~

## 【口述历史】

### 林彪的吃喝拉撒病——访内勤刘文儒

• 刘家驹 •

刘文儒是1960年从一个战士走到林彪身边的。建国后，林彪因战伤造成的神经官能症，一直在调养，刘文儒像对待自己父亲一样，伺候林的吃喝拉撒睡，毫不懈怠，林深受感动，说：“你伺候我做的事，我的子女都做不到。”还准备把女儿豆豆许配给他。913事发，刘文儒负罪莫名，愤然拒绝给他安排的职务，坚决回归草根。他今年已是74岁孤寡老人，养老金微薄，仍在坚守着自己的信念和道义。他记忆的往事，有思想，有感情，是真诚的，林彪吸毒吗？装病吗？是怎么出走的？他都会开襟见怀的告诉你。

◇ 初见林彪就是一个病秧子

刘：当年把您选调到林彪身边，是百里挑一吧。

文（儒）：我是天津宝坻人，1958年底入伍到的196师，我从新兵训练队出来，就分配到师工兵营的卫生所当卫生员。1960年春的一天，师参谋长把我叫到他办公室，问我哪里人啊？念了几年书？家庭情况怎么样？问完后说：“你把工兵营的防疫情况写个报告给我。”

参谋长找我谈话时，我看到旁边坐着一个穿便衣的，后来才知道他叫李文普，是林彪的警卫副官，他是专程来为林彪身边选卫生员的。他在一边审视我，听我说话口齿清楚不清楚，反应怎么样，没吭一声。参谋长要我写东西，主要是看我字写得怎么样，文理通不通顺。过了一个多月，师参谋长又找我谈话，才告诉要调我到国防部，说：“那里大首长多，要好好干，我们就挑了你，是拿着脑袋担保的。”

进京是师的军务参谋护送我的，到国防部大楼就把我交给了李文普，我这才知道他的名字，他一身军装，中尉军衔。李文普就带我到公主坟的招待六所。

六所院子挺大的，平房多，有果园。李文普介绍说，这是中央的内部招待所，首长暂住这里。我不明白他说的首长是谁？他把我带到一间办公室，一个叫关光烈的秘书让我坐下，他出去不多会，就领来了一个中年妇女，介绍说：“这是叶主任。”我起立敬礼，她让我坐下，亲切的问起我的家世，文化程度，在部队做什么工作。她每问一句，我都站起来回答。

“以后你在这儿要好好工作，为林元帅服务。”

林元帅？好大的官啊。我的心血陡地往上涌，没想到自己一下像进到南天门。叶让关秘书安顿我的住处。

通过一条长长的走廊，来到一间小屋，这里是林的勤务值班室，一个矮墩墩的战士站在屋

当央，笑微微的望着我。关秘书对我说，他叫小郭，在值班，也是你们196师的，来这里已半年了。

小郭也是宝坻人，他家离我家有十几里，老乡见老乡，分外亲切，他告诉我，刚才和我谈话的叶主任叫叶群，是首长的夫人。林彪元帅我们称呼他首长。他要用你就打铃，你听到铃声，马上到他跟前听吩咐，叫干啥就干啥，不要多嘴。小郭分工我每天打扫卫生，送三顿饭。

刘：你是怎么第一次见林彪的？

文：工作了两天，我心里一直记挂着见林彪的事，小郭知道我的心情，这天来了客人，小郭让我去送茶，我端着杯子进了会客室，第一眼就看见林正坐在沙发上和客人说话，他那副样子让我傻眼了，是个老头啊，一身便衣，瘦骨伶仃的，头发都快掉光了，这是我想像中威武的林彪元帅吗？我记住小郭的话，赶快退出来。

我对林的第一印象至今不忘。在小学课本上他那生气虎虎的战将形象，在我心目中全消失了。后来，关秘书告诉我，1938年他在山西给阎锡山的兵误伤以后，到苏联治疗，神经功能没有得到恢复，就匆匆回到国内靠自己将息，身体一直是病恹恹的。关秘书的话给我心中增添了一股敬重他的责任感，我要伺候好他。

刘：来的客人你知道是谁吗？

文：不认识啊，后来小郭告诉我是叶剑英元帅。平常他们都不穿军装，不穿军装见面也敬礼，我不明白，都是元帅还有上下之分？

◇ 林彪一日三餐吃些什么

刘：你开初是怎么值班的？

文：刚开始做林的內勤，我很不习惯，说话不能大声，走路只能快走不能跑。每天擦桌子扫地，没事就窝在小房子里，多没劲呀，一天到晚连个和你说说笑笑的人都没有，我念叨部队，想回去，可来时头儿说他们是用脑袋保我的，怎么说也得干几年呀。

一年后小郭调走了，林的起床睡觉，打扫房间卫生，冲厕所，开窗换气，都由我一人来操持。

刘：林每天的作息是怎么安排的？

文：他身体好的时候就6点起床，看一阵文件，到我就给他弄饭吃，早上7点半吃饭。他吃完早饭总是在走廊里转。走廊一头有个沙发，转累了就往那儿一坐，这时秘书就开始给他念文件了。下午通常重复上午的活动。林吃完晚饭也要坐下来待会儿才到院子里走走，有时候叶群陪他，豆豆或老虎在家也陪着转，没人陪他就自己转，转到晚上9点多钟回来就睡觉。

早些年，林还到公主坟街上活动活动，拎只小收音机边走边听时事，我就在后面悄悄的跟着，躲在电杆或树杆后面盯着他，因我有保卫他安全的职责。那时，认识他的人很少，活动也很自由。

刘：林的一日三餐都是你端上桌的，他都吃些什么？

文：1960年我刚到时，他们一家四口还能在一桌吃饭。文革开始，豆豆和老虎都到空军上班了，叶群忙，起的晚，林的三餐都是自己一人吃。

林吃的比较简单，比如洋白菜、菜花、空心菜、胖头鱼他都吃，他吃的菜都是煮的，拌点油盐，还不得放葱姜蒜。他拒绝吃炒的菜，说吃了上火。主食是馒头。馒头切成片泡在汤里，吃的时候要去掉汤。林吃的菜通常盛在几个小碟子里，他不喜欢吃的就放在一边。长期素食，营养很差，林的脸上几乎没有血色，叶群想了办法，在林的面食中掺了些高蛋白。

外出的时候就带个菜谱，我每到一个地方，就先把菜谱和制作方法交给那里的厨师。当时他还能喝些水。到1965年后喝水少了，饭量也小了。

刘：林像苦行僧样生活，营养能保证吗？

文：叶群想了个办法，把肉剁的很粹，做成小饼给他吃。

刘：他没有食欲，是不是有萎缩性胃炎？恐怕还是过去他在战争年代长一顿短一顿造成的。

文：他从未有饥饿感，反正到点就吃，每顿像猫食。他给我说过一个故事，红军时期，打了一场败仗，逃跑了一天没吃上饭，饿的难受，正好窜到一个地主家，锅里炖的是肉，好香啊，又是大年三十，那是他最好吃的一顿饭。

刘：听说林饭前不洗脸也不洗手。

文：早些年他早上起来，我把水给他放好了，放上毛巾他就自己洗。到1965后就不洗脸不洗手了，吃饭时，手在裤子上蹭两下抓起筷子就吃。晚上上床休息也不洗，我给他弄块半湿的毛巾擦擦就行了。

他中午吃饭老是爱出汗嘛，只要一出汗就呆呆的躺在床上，生活秩序也乱了，后来他就先睡觉，不管睡着睡不着，到下午两点起来再吃饭。

◇ 不愿洗澡，不愿换衣服

刘：洗衣服，洗澡啊，这些都是由谁来照顾林？

文：洗衣服的事就交给了王老太。老王是陪伴豆豆的，也照顾叶的生活起居。

林平时出汗多，怎么也不让换内衣内裤，都穿两三个礼拜了，我坚持着动员他，说：“你出汗还穿着，更容易受凉，换件衬衣吧？”他同意了，就说：“你说的对，换一件吧。”换下来的衬衣脏着呢，领口黑不溜秋、光几几的，老王得用洗衣粉泡上两天，再拿搓板搓洗，费劲着呢。

平时林的衣服修修补补也是让老王来做，林蹲厕所屁股露着易着凉，老王就把林的衬衣后摆接出一块来。

早先林不愿洗澡了，我对他说：“你好久没洗澡了，等天好了，给您洗一下澡吧。”林说：

“讲卫生的事，不能全信医生的话，你要都听就活不了。”他又说：“你看农村的孩子多脏呢，人家也没病没痛的，西藏的孩子生下来洗一次，死时洗一次，不也活的挺好嘛。”

后来他到庐山，住在美庐，那里原是他校长蒋介石的别墅，宋美龄的画，蒋介石着军装的像还留在墙上。美庐有一个小锅炉，早些年蒋宋就用它烧水洗澡的。有人告诉林说，老蒋的睡眠好，就是经常洗澡。林从那儿开始天天洗浴，下山后还能做到十天半月洗一次。

林要洗澡我帮他弄好水，还要拿温度计量。温度要求调到37度，他自己洗，洗的时候水里要放点醋精，用药皂，红颜色的那种。他洗澡很快，在水里胡弄几下就上来了。

◇ 冬天，我用体温焐热他的衣服

刘：你侍候林每天都要做些什么准备？比如根据他的习惯，安排他的什么活动，你得事先要想到一些问题。

文：先要考虑到他的身体情况。比如，什么时候给房间通风，什么时候搞卫生，通风时他坐到客厅，我就把卧室窗户打开，如果他在卧室，我就把客厅给通通风。他怕风，一般不大开窗。外出时，天气变化该添加什么衣服，穿什么鞋，这些事我想的比较细，比较多。

刘：我见过他睡的床，不宽，只有一米三五。

文：对。他不睡大床，也不睡席梦丝，他无论到哪儿，就睡棕床上加一层软垫。每次外出，我们就把他的被子衣服用大帆布口袋装好带上。他穿的、盖的都不用别人的。

刘：他用的是军用被子还是普通的棉被？

文：刚开始只用小薄被，后来把小薄被淘汰了，全用毛巾被。毛巾被有七八条吧。

刘：他穿的衣服有什么要求？

文：林平时最注意自己生活的空间就是温度，日常穿衣多少要根据温度来定，这是1950年代北京医院的专家给他定的，以温度30度来增减衣服。那时候还没有空调呢，我就用温度计测定。如果超过30度，林穿衬衣就够了，如温度在28度，就给他加一件布料的。他穿衣服厚薄都有规定，有温差2度的，温差4度的，温差8度的。夏天一般没事，他穿一件衬衣就够了，35度也如此。秋天和冬天就不行，有时刮大风，窗户密封不好，虽然是两层玻璃，我得个把小时要看一次温度表，他自己也看，温度低了就主动找我给他加衣服。比如冬天，他外出时若是零下十几度，给他把皮帽子一戴，大衣一穿就完事。

最初给他加衣服，套三件身上就拥挤的难受了，他要我把领子给拆掉，穿上身脖子好受些，他又发现口袋堵胸，我又给他把口袋拆掉。

他从不穿棉毛衫，背心也没有，冬天不穿棉。他起床时，我得根据多少度再给他配什么样的衣服。他穿衣服不讲究，只要合适温度就行。每天看温度计成了他的常态，走廊、厕所、会客室到处都为他安放有温度计。

如果衣服、鞋子坏了，就给叶群说，叶群就给买，或再做。



他的换洗衣服有七八件，都是旧的，衣服边儿磨裂开了，就让老王修补，不行了，叶群就给他再做一件。

刘：我听说你给林穿衣服也是怪怪的，要用您的体温热烙。

文：冬天林起床时，我要他躺在被窝里别动，我先把他要穿的衣服穿上半小时，用我的体温焐热后，再扶他起来给穿上。他要是穿三四件衣服，我就把它套在一起，只焐一次就够了。

刘：你为什么不用热水袋给焐热？

文：用热水袋焐背部太烫，两边衣袖还是凉的，我用身体加热的衣服温度就均匀了。

刘：年年如此？

文：就是每年的冬天天天如此。这事让他感动了，对我说：“你侍候我做的事，我的子女都做不到。”

◇ 吸毒，打强心针，都是胡说

刘：报刊上时不时说林吸毒。还有个摄影记者说他在天安门上还闻到林的身上有鸦片烟味，是真有其事或是胡说乱说？

文：我一天24小时都在林身边，林干了这种坏事，我能不报告？什么渠道提供的烟土？谁参与？说得出来吗？

刘：林治疗枪伤曾两次去苏联，跟随他的副官于保孜说，林在治疗期间闻听到斯大林消除自己的政敌，就是通过医生用药谋杀的，林的病未愈就匆忙回国。回国后，对国内医生也不信任了。自家弄了本药书研读，自己处方。解放战争的1947年，他在白城子自己开方子吃，差点死了。建国后，就靠自家疗养，从不求医。301医院副院长曹根慧告诉我，有一次，林患肠炎，曾宪九主任给他处方用药，硬是不吃，曹根慧上门来劝说，也不吃。曹把周恩来搬来了。周当着林的面把两片药放在自己嘴里吞下，在林身边坐了两小时，说：“你看，在我身上没什么反应嘛。”林这才开始服药。我和建国后在林身边的秘书、内勤都交谈过，他们都认定林患有神经官能症，体质虚弱，你在守护林生活多年，应该比你的前任所见所闻更加清楚。

文：林体形瘦小，脸色终年苍白，50多岁就颧骨突起，走的步态沉重，体重只有80多斤，要是脱光衣服，你就能看到他仅是一付骨架子，

他神经一直是衰弱的，经常失眠，心脏有时也难受，睡不着就叫我：“到我这儿坐一会儿吧！”我就坐到床跟前的沙发上跟他聊。他发困了，就说：“你看到我要睡着了你就走。”有时长时间睡不着，就说：“别管我了，你去睡觉吧！”

他怕出汗，一出汗前胸后背一片水湿，他不愿换衣服，自己躺在床上把汗焐干。

我长期失眠，靠悄悄抽几支烟或服用安眠药，才能没日没夜围着他转。

刘：有人说他上天安门要靠打强心针支持。你们还经常给他注射改变思维、改变意志和记忆的针剂，有这种事吗？

文：全是胡说八道，给林打针，都是我打的，注射的都是维生素，根本不是什么剧毒药品。

有人说他装病，我一天到晚守着他，能装吗？他确实有神经官能症，怕冷怕风，有次转车，车玻璃没关严，回来就躺下了。他在全中国漫游，选择住地要避水，在北戴河或在青岛的住所都靠山背海。他的手要是摸了发凉的物件就会身上出汗。

林的卧室里那块大木板上都是他的生活记事，他的总结有一大堆，比如今天吃什么东西出汗，吃什么东西不出汗，凡是出汗的，以后就不吃了，或吃什么东西拉肚子——他都写在黑板上。只要他生活中信奉的经验，要我都记下。有时他口述我记。他没事就这么琢磨，找原因，弄出好多条，一条一条都要我记住。他说：“我要是把这事忘了，你提醒我啊。”

刘：1966年7月，林在大连犯病了，痛的夜里睡不着，白天起不了床，豆豆见他夜里在水泥地板上打滚。

文：听小陈讲，林在毛家湾肾结石病犯了，也是在地上打滚。就是这付身体，毛还要林去北京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当上了接班人。

◇ 林彪有自己的生活理论

刘：林从不吃水果，也不喝水，听说他肠道经常梗阻。

文：他的生活习惯我无法改变，他经常个把礼拜都不拉大便，一拉就跟驴拉的一样，挤出一个个粪球来，撑的他肛门破裂直流血。我在他便盆边上总是放个热水瓶，他要拉，我赶快倒点开水涮一涮便盆，增加温度，还得赶快拿干布擦净水气，放在凳子架上让他坐上

要是拉的不是粪疙瘩了，他要我看，说：“拉肚子了。”我一看，粪便成条软了，还是干的啊。他说：“多可惜啊，这么多营养都拉出去了。”我当着他的面不好说，当元帅了，学马克思主义的，怎么连点儿生活常识都不懂？

他说不好病就来了。1963年在广州，住在汪精卫的房子里，一天，起不来床了，北京专家来会诊后，他告诉我生病的原因，说：“睡觉不能总一个姿势啊，得翻身动弹啊，一动，被子没盖严，肩膀露出来了，所以病了。”后来他想出一个办法，用一根木棍，约50公分长，他睡觉时，要我把棍子从他脖子底下穿过去，再用两条绑带，将木棍的一头绑在左肩，另一头绑在右肩。两边都有了挡头。一动不就翻不过身了吗。

刘：这不是自己在找罪受吗？，

文：林说他翻不过身时自己会醒的，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总比凉着肩膀好。

刘：听说他常年坐的沙发是特制的？

文：对。那年去上海，他坐在招待所的那个沙发上不出汗了，说这挺好的，走时他让我把它一块儿带走，秘书给人家算账付钱买下来了。他坐的沙发后面有个靠垫，是真皮的，后来，我给他弄了个木框子的棕垫靠着，果真不出汗了。他喜欢这样拼装的沙发，坐垫底下悬空的，

靠垫是中空的，不论走到哪都带上坐垫和靠垫。

◇ 给林彪用假药安眠

刘：林精神上是不是还有一种癔病？

文：要说他精神上有病不为过，他一说这不好那不好，只能想到让他睡好，给他打假安眠药针剂，实际上打的是维生素，对他心理的暗示有相当效果。他就会说：“我睡觉睡的好了。”如果哪天他感到不舒服或汗出的多，我说成是天气原因造成的，就诓骗他说：“今天阴天啊，气压低。”他就说：“噢，对，对，气压低了，人就难受。”他一听心气平和了，没事了。要不，他就会癔想，是不是吃的东西不对，或者是不是受凉了？

刘：谁来给他用假药？

文：我来给他用。

刘：你要做的很像啊，你让他吃的胶囊他会分辨的，怎么办呢？

文：胶囊是从北京医院领的。安眠药胶囊是半截红半截黄的那种，我把原装药给倒掉，然后把维生素药片弄成末，用那空胶囊把假药给装上。再送给他吃。有时候他睡不着了，一会要一个，过量了，第二天早上昏昏沉沉的还醒不来，好些天我就不给他了，实在不行了，就给他打安眠针剂。

刘：用假药叶群非常清楚，是她指挥的吧？

文：对，她指挥的，我哪敢用，打针也好，吃药也好，包括其它的骗法，都是她支的招。

刘：听说叶群经常在生活上要求你们骗林，是吗？

文：蒙他已习惯了。叶群体谅林的处境，她骗林的出发点有好的一面。林不出门，不接触人，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以后他连文件也不看了，也不到毛主席那里去参加会了，他心里烦躁，报纸上的事，社会的各种问题，叶不让我们告诉他。另外，叶群把中央文件上的、军队的和社会上发生的事，经过挑选后才传给他，你说他能知道什么啊？

◇ 叶限制了林，更是限制我们，什么事也不让知道。

刘：有两件事你应知道，一次贺龙来见林，叶说贺龙身上有小手枪，要你们都带上枪埋伏在会客室四周，防止贺龙行凶，结果什么都没发生。贺带枪的事，是毛泽东告诉叶群的，给叶小题大做了。

还有一件事，大概在1963年吧，老帅中有个被称为“花帅”的，生活作风很浪，林把他找来，代表组织和他谈话，批了他两个小时，“花帅”离开出门时，脸上还是泪花花的。

文：……

◇ 老虎喜欢长江的激流

刘：你随林外出时，炊事员是从毛家湾带去的、或是当地派来的？

文：林外出时不让带自己的炊事员。司机也不带，就带秘书，内勤，他确实是你们说的轻车简从。

一次林去庐山，带了叶群、豆豆、老虎，秘书周衍盛和我跟去的。我去是游泳好啊。叶就让我跟豆豆、老虎天天去庐山水库游泳。水库深着呢，中间弄一个大木筏，人可以上去歇一歇，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他就是坐在木筏上面。

刘：毛泽东去庐山水库的时候，有好多女孩子围着他转啊，都是海政、空政文工团的。

文：对啊，好多人，女孩子头上的泳帽红红绿绿，像水面上开的花。有的女孩子不会游泳，身上还给套个圈。老虎嫌水库风平浪静的，提出要畅游长江。

刘：九江那儿的水挺急的，有漩涡啊。

文：对，我们从上游到下游游有30多里地。长江江面宽阔，无风三尺浪，浪扑面就呛水，我的心都发怵了，老虎真是老虎，他胆大，一直在激流中冲撞游了30多公里。

◇ 秘书每天给林彪念文件

刘：秘书给林念文件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文：叶群每天把传来的几十份文件精挑出几份重要来，让秘书给他只讲一二十分钟。扼要的说说国内的什么事，国外的什么事。有时林听到值得他重视的问题，说：“把这个文件给我留下。”文件要入档的，秘书经常来找我，说：“首长上次留的那份文件放哪儿去了？你帮助我找找吧！”

刘：一天讲文件几次？

文：一般都是上午给他讲一次文件。叶群没当政治局委员那几年，常来林跟前山南海北的聊天。偶尔外出只是去商店逛逛，更多的时间呆在自己房间看书，她把书上政治的，历史的或有趣的故事就来给林讲。

刘：听说林有性功能障碍，林叶不住在一起？

文：一直是分居的。

◇ 林彪会弹钢琴，想打仗

刘：林一天到晚就这么孤孤独独的，就没有一点嗜好？

文：在走廊上我给他摆了个留声机，这是三十年代的产品。林最喜欢听轻音乐和梅兰芳的。有一回，我见他坐在豆豆房间里弹钢琴，弹的很流畅，不像是初学的。我万万没想到林还有这么一手本领。

林也吃零嘴，他只吃花生糖，他想吃的时候，不言语，对我只伸两根手指，表示吃两块。

中苏边境紧张，他招来总参作战部的人，地图在客厅墙上挂满了。有时他一人坐在那儿看，林还让小陈帮助他背图。那些天，小陈跟着他早起晚睡的看地图，背地图。小陈叫陈占照，刚调来林身边当内勤，挺聪明，高中文化。

要是平时，林越想自己身体不行就着急，越着急越出汗，一出汗就动不了了，一直是这样的恶性循环，可要他准备打仗就兴奋，脑细胞也激活了，身体也好了。

1969年，他到三北地区视察，手中不离地图，走一路看一路。后来，紧张形势和缓了，他亢奋的精神状态也蔫了。

◇ 很少参加会议，从不写日记

刘：林参加会议多吗？

文：他隔几月就要给主席那里去汇报一次，中央开会他也得参加啊。一般主席召开的，总理召开的他都会去，后来就有选择了。”他说不去，秘书就得给请假。

刘：好多会是叶群代劳了？

文：刚开始没有。叶在文化大革命中间才代林出席各种高层会议的。

刘：林参加会要讲话，他有什么准备吗？

文：有准备，准备也特别。开会之前他在屋里转啊转的，然后停下来在一张纸片上写几条，再转，再写。他记的东西过一段就自己清理，有的留着，有的就不要了。

他开会讲话一般不用讲稿，也不善于拿着稿子念。我在毛家湾的时候，就没见过一个秘书给他写过讲稿，他记的字条上只有只个字，秘书们说，几个字或一句话，就能牵动他要说的全部内容，怎么讲，只有他自己知道。

刘：他记日记吗？

文：我从未见过他记日记。他偶尔要写什么，我给他在走廊的两头安置有张小桌，放上红蓝铅笔和纸，他在走廊散步，想起什么就写上几个字，记日记是根本没有的事。

◇ 漫游养病兼顾视察战区

刘：林为了养病，在全国漫游，去了些什么地方？

文：1962年，正是福建前线紧张的时候。我和李文普跟他到厦门后，不让他到前沿去，他非要去望望金门，不让人跟着，说：“目标大，我一个人上去就行了。”他硬是一人往几百米山上的观察所爬去，李文普不放心，还是远远的跟着。那时候他身体还行。

每年他在北京待的时间大概有七八个月，冬天去广州，春节以后广州开始变潮湿了，他就得走。夏天到比较凉快点儿的地方去，如大连、青岛或东北，还去了甘肃卫星发射的二十基地。那地方是大沙漠，特荒凉，招待所只有一个招待员接待我们。

他到哪儿都是低调，不准地方或军队首长迎送，不得拍照拍电影，凡是开班长或连排干部参加的座谈会，林规定，要保证畅所欲言，他们的上级不得到会。

◇ 林彪出走是给诓骗上飞机的

刘：我们党历次搞政治运动，都要来一次大扫除。1986年中央有个发到省军级的6号绝密文件说，处置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共清理了21万多人，其中省军级干部709人，地师级干部3030人，县团级干部10056人。光空军机关就扫地出门2400多人，你在林身边这么多年，最沾“腥”味，是怎么处理你的？

文：913事件那些天我不在北戴河，出事我一点都不知道，一直等到北戴河林办的那拨人回来后，中办主任王良恩才来毛家湾传达中中57号文件。他传达完说：“你们现在都知道林彪跑了，知道了你们就甭回家了。”我们20多个工作人员给关到毛家湾的东院。

那天，我穿着凉鞋，没穿袜子就给圈住了，从此5年没有回家。还对家人谎说我出差了。

刘：把你们集中在亚洲疗养院办学习班，你们中间在学习班大批大揭林彪，你记忆中反应最强烈的是些什么啊？

文：林彪是九大选的，专案组没完没了地逼我们交待他的“罪行”。专案组的朱志和说：“把你们派到毛家湾，就是让你们保卫毛主席路线的，他搞阴谋诡计你们不知道？”我说：“我们水平低，看不出来。林彪当接班人，写到党章里，是你们说了算，不是我们说了算，你们都不知道的，我们就应该知道吗？你们都看不出他有阴谋，我们就能看得出来？我们有那么高的本事？”

刘：陈占照是最知情的，913那天晚上他一直在林的身边，他给你们说了些什么内容？是不是说林彪被老虎叶群诓骗走的？

文：豆豆是7号到北戴河的，小陈给豆豆讲了林立果在北戴河的活动，豆豆很警惕，要小陈千方百计儿的保护好首长，处处留心老虎和叶的行动。12号深夜，小陈见林立果和叶群紧张的进到林的卧室，感到有事，他马上转到过道的厕所，一墙之隔正是林的卧室，他贴耳听到叶对林说，在北京他们把黄吴李邱都抓了，马上来北戴河抓您了，我们得赶快走。林说，我就不走，死也死在北戴河。叶劝了一阵，要林先到大连避避风。林这才走出房间，在过道上叫李文普，说他睡不着了，要马上走，去大连——小陈听来的这些话，是在亚疗学习班审查我们的时候给大家讲的。那时他没屈从于人，我印象特别深。

刘：小陈一个人说，在法律上叫孤证，不会采信。

文：反正当时小陈就是这样给我说的，很多人都听到的。我们都关在亚疗办学习班，要大家揭发批判林，小陈在政治高压下，能对我们说出这一事实，是很有勇气的。我们毛家湾的人，都知道小陈单纯，从不会说谎。

刘：公安部长李震说：“不管李文普左臂上那一枪是不是他自己打的，只要没有跟林彪跑就是好同志。”李震话里有话，作为公安部长为什么说得那么圆活，是政治的需要啊。

文：在北戴河带枪的有李文普一个，刘吉纯一个，再一个就是我。林彪身上哪有枪？五九式的新式手枪林彪会用吗？

◇ 我给扫地出门，负罪一生

刘：9 1 3 事件后，审了您几年，你从学习班出来怎么转到地方了？

文：专案组审了我四年，给我做的结论是“犯有一般性的政治错误”。1 9 8 0 年初，我转业到天津塘沽电器厂，安排我当厂长，我不干。我说，我就当工人。组织部门的对人说，这人脑子是不是有病啊？

关我的时候，我的孩子还小，老婆是糖尿病，我妈身体也不好，一家老小都在望着我，我有什么罪啊？我有一种无法忍受的情绪，对一切事物都心灰意冷。9 1 3 事件中央都对，就我们做服务工作的错了，该倒霉。在电器厂干了整整5年，心里一直是沉甸甸的，老惦记家人，想回北京，我申请，上访，没人不理采我。一位好心人悄悄对我说，你是林彪的人，不会让你回北京的。偌大的北京竟然容不下“林彪的人”！我上访总政，总政不敢说原因，只说你已交给地方，由地方案管你。我又找中组部，中组部说，你的安排是总政定的。来回的相互推诿，我整整跑了五年，才得到北京户口。

从塘沽回京之后，安排在低压电器厂，我再不想干什么了，领导说：“你先去做饭吧。”我说：“好。”

做饭做了一年，领导非要我到车间去当支部书记。我去了，三天两头给党委写报告干不了，就是不批，我硬着头皮干了一年，领导才松口说：“这样吧，上收发室。”我说：“这挺好。”

刘：你服侍林忠心耿耿，你知不知道林很想把豆豆许配给您？

文：不会吧！人家是大学生，帅府千金，我哪能般配？

刘：豆豆也给我说过，决不会是假的？

文：豆豆对我家很关心，我住院她帮忙找医生，钱她接济，我敬重她，她是林家剩下来的后人，她后半生一直在为林冤案奔走，我祝福她长命百岁。

刘：你伺候林彪含辛茹苦，时运让你落罪一生，如今你已是7 4 岁的暮年，有悔恨吗？

文：我从南天门摔下来，活着只能听天由命。不再去要求官方给我纠正“一般性的政治错误”了，每年春秋时节，我烙上一张饼，带上一壶水，去到北京的郊野，那里没有烦恼的事，空气又清新，大自然会给我晚年最公平的待遇。

□ 《前哨》2 0 1 3 年第7、8期

~~~~~

【书刊评论】

“妖魔化”与“美化”皆不足为训
——《“九一三”回望》读后

• 东方铁 •

有人说：历史事件离我们越远，其真相就越清晰。可是，“九一三”事件过去四十多年了，它却依然扑朔迷离。有多少人回望它、发掘它、研究它，却依然见仁见智，莫衷一是。甚至可以说，有些情节不仅不清晰，反而更加模糊不清了。但似乎越是如此，它就越是有魅力，吸引人们去追寻真相。

最近，文革史学者余汝信先生主编的《“九一三”回望——林彪事件史实与辨析》一书出版了，对于我们接近事件的真相有所帮助。

这本书分为两部分：上编汇集了七份珍贵资料，包括林立衡写给中纪委的材料、叶群的二次书面检讨及毛泽东的批语、“571工程”纪要和毛泽东南巡谈话纪要。下编汇集了四位研究者撰写的研究报告。

书中的史料难得一见，真实地记录了当年的史实，为其他研究者和读者提供了继续深入研究的素材。三十多年前，我曾作为军队报纸记者，参加了“两案”审判的采访报道。书中列举的材料当时大都看过，也听说过林立衡有一份“万言书”，却未能见到。这次在书中看到了材料原稿的影印件，算是得偿所愿了。

四位研究者的文章，从不同角度对事件真相作了研究和辨析，很有价值。其中余汝信对《林立衡关于“九一三”经过写给中纪委的材料》的解读（见本刊 z k 1 3 0 5 b ——编者），依据材料原稿，抽丝剥茧，从十二个方面作了细致的分析。他的分析，既有别于以往官方的版本，也不苟同于林立衡自己的说法，给人以很大启发。

我以为，这本书最大的特点是其客观性。对“九一三”事件的研究，是与对建国后特别是“文革”期间林彪的评价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战争年代林彪的评价比较一致，这里不再涉及）。这方面的评价，历来有两种倾向：（一）过去是一边倒“妖魔化”，而近几年“美化”的倾向抬头；（二）官方的评价基本仍是“妖魔化”，而民间则“美化”较多。不同阶段、不同层面的评价大相径庭，直接影响到对“九一三”事件的研究。

但无论是“妖魔化”还是“美化”，都不可能得到事实的真相。

提及“九一三”事件，人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是林彪为什么要跑？这个问题，恐怕跟林彪对“文革”的态度有关。在历史上，林彪一向是毛泽东最坚定的拥护者，是毛最信任的军事将领，而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在“文革”中发生嬗变的。

不容置疑，林彪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给予了最有力的支持，在这方面他难辞其咎。但他与毛又有所区别，毛是“文革”的始作俑者，林则是“文革”的既得利益者；毛是领导者，林则更多的是旁观者；毛搞“文革”是一意孤行，林则是三心二意，尤其在“九大”之后他的治国理念与毛有所不同。加上毛是一个多疑的人，视军权如命根子，对以林彪为首的军人集团崛起心怀很深的疑虑，这就注定了毛、林迟早要分道扬镳。

如果仅仅是政见有分歧，即便毛冷落林甚至夺他的权，也不足以促使林彪出走。但由于林彪的军人背景及性格，以及他们（包括叶群、林立果）有动武的可能性（哪怕只是策划），这就注定了他们与毛泽东的分手很难在和平之中进行。尽管后来黄吴李邱和林立衡等人对“刺毛”和“武装政变”有种种辩解，但至少林立果是曾经企图动武的。动武牵涉的人很多，一旦审查起来是很容易败露的。“谋反”自古以来都是最严重的罪行，足可“诛九族”，对此，熟读历史的林彪当然很清楚。无论林彪是否事先知道叶群和林立果有“刺毛”之举，至少在出走前是知道了。他深知毛泽东是一个睚眦必报的人，岂会对此善罢甘休。在斗又斗不赢，打又打不了的情况下，只有跑路了。

林立衡有关林彪被叶群、林立果劫持走的说法，殊不可信。单从众多人目睹林彪自己爬上飞机来看，他就不可能是被劫持。但如果说是林彪走得不很情愿，则有可能。他对亲人特别是独子林立果有很深的亲情，在得知妻儿面临杀身之祸的时候，为了避开灭顶之灾，保护家人而出走，似乎符合林彪的心理。如果一定要说林彪被“劫持”，那么可以说，他是被亲情和家庭利益“劫持”了。

但是，林彪这么一走，问题的性质就变了。毛泽东在处理彭德怀问题时曾说过：“其他一切都好谈，里通外国就难办了。”这句话道出了他整彭的诀窍：把人往死里整，最绝、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指控他与外国有联系。只要判了“里通外国”之罪，就罪加一等，永世不得翻身了。林彪也是如此，飞机飞出国境，就怎么也说清楚了。

现在有人用“小杖则受，大杖则走”来为林辩护，认为林走得有理。这种说法是不懂政治。林彪不是普通人，而是党和国家的第二把手、中国军队副统帅，无论以何种理由，擅自出走敌国都是叛国行为，这个利害林彪是很清楚的。也有人说，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也曾为躲避迫害而移居外国。但那时他们都不是执政者，作为一名自由职业者，哪里都能去。而林彪则有公职在身，二者不能相提并论。

林彪的出走，实在是他最大的失算，也是他的死穴。这位身经百战的元帅，在政治斗争的关键时刻不能保持灵台清明，作出了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不智选择。所以，黄永胜才怒吼“跑什么跑！”毛泽东也才高兴地说：“林彪帮了我一个大忙！”这个忙帮得太大了，不仅使毛将一切罪责推到林的头上，处理起来容易多了，更重要的是他能够以反林彪“极右”为名，继续推行其极“左”路线。

研究“九一三”事件，绕不开林立衡。对于林立衡在“九一三”事件中的角色、作用及其原因，余汝信等四位作者在书中作了认真的分析，他们的看法颇有道理。

“九一三”事件后，林立衡为了给林彪翻案作了长期的努力，其志可佩，其情可悯。从某种角度看，这也是对以往“妖魔化”的一种抗争，可以理解。但是，从大量的事实看，要想翻这个案，实在不容易。至少目前披露出来的证据，还做不到。

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我以为，林立衡有典型的恋父情结。她与林彪之间的父女感情是极深的，其中既有对父亲的爱，也有对英雄的崇拜，加之与叶群不和，进一步加重了这种情感。但因为她的举报，造成林彪仓皇出走而坠机身亡的后果，这是她始料不及的，也是心理上不能承受的。在当了一小段时间官方封的“英雄”之后，她的自责、悔恨心理开始占据主导地位。我相信，假如事件重新再来一遍，她大概不会去举报。

书中谈到，从林立衡得知林立果想“挟持首长”到林彪出走，耽误了五天时间。其实，这怪不得她。要作出如此重大的判断和报告中央的决断，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肯定有一个了解

情况和思考的过程，可以想象她有过的迟疑、犹豫、焦虑、举棋不定，以致延误了时间。面对这样的事，谁都很难做决定。如果为此自责，则大可不必。

我不知道她这么多年有没有做过恶梦，但她的内心深处对自己当年的行动即便不是追悔莫及，也是无法平静的。如同电影《沉默的羔羊》一样，她潜意识里的“羔羊”不会沉默。也许是这个原因，她才要用自己全部精力来为林彪洗刷，才制造出林、叶不和等说法，既为林彪辩护，也为自己的行为辩解。或者说，只有为父辩护，才能在心灵上为自己辩解。只有这样，才能弥补当年因她举报而间接造成父亲死于非命的深深歉疚，冲淡自己的负罪感，稍微抚慰自己不安的心灵。

因此，林立衡在材料里说的那些东西，既是想说服别人，更是要说服自己。这一点，可能连她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或者故意不去意识。从这个角度来看，她在材料中一些说法不断变化，就不奇怪了。

事实上，林彪的出走并不像官方说的那样主动，也不是林立衡说的那样无奈和被动；当年林立衡的行为，既不是英雄行为，也不是弑父行为。她无须自责，也无须不安和悔恨。当年的一切，都是那个时代的必然产物，都只能从当时中国社会政治的历史背景去认识。谁也不用责难谁，当然更不用自责，是那样的时代造就了那样的事、那样的人。

林立衡最不能释怀的，是林彪集团受到审判。其实，她作为一个政治家族的成员，应该对这个问题看得很透。首先，那次审判实际上是对“文革”罪孽进行清算的一种形式，以此为那段历史划上句号。毛泽东当然要对“文革”罪行负主要责任，而林彪作为“副统帅”，也有无法推卸的历史罪责。而且如前所述，对林彪的出走也要有个说法。我相信，假如林彪不走而被毛赶下台，即便他在“文革”中有严重的错误，后来也不会对他这样做。其次，是政治的现实需要。“文革”结束后邓小平要掌控军权，需要采取这样“祭旗立威”的行动。当时一个“两案审判”，一个“真理标准大讨论”，一个对越自卫还击战，都是有相互联系的部署。

通览这本书，对“九一三”事件的回望，主要还是案头的分析，不少说法是推测，缺乏证据。但我们可以说的是，无论“妖魔化”还是“美化”，都不足为训。要想弄清历史事件的真相，必须从客观事实出发，还有待于发现更多新的有力的证据。我们只有继续等待。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胡海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y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